



马宏杰 作品

西部招妻

人的生命有时像一粒种子，随风飘落到什么地方，
都得生根、发芽、成长，哪怕这种生长是扭曲的。

马宏杰 作品

西部招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部招妻 / 马宏杰著.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213-06057-1

I. ①西… II. ①马… III. ①摄影集—中国—现代
IV. ①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77026号

书 名	西部招妻
作 者	马宏杰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陈巧丽
责任校对	鞠 朗
印 刷	小森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6057-1
定 价	45.80 元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序

真实

柴静

第一次在《读库》上看到马宏杰的《西部招妻》，看得我吓一跳。这感觉只有十年前，看赵铁林拍《阿V姑娘的日子》的照片时有过。

马宏杰拍了河南残疾人老三找妻子的过程——先娶了个有精神病症的女人，但不肯跟老三过夜，母亲急疯了，去找丈母娘理论，没人有办法。老三只能听村里人的建议，把安眠药放在饮料里，但不知是不是假药，对媳妇没用。老三也不愿用暴力，只好离婚，然后就去宁夏“招妻”——实际就是“买媳妇”。

当地有不少以此为生的人，也有老人收养孩子，等长大了再把她们嫁出去收钱。

马宏杰拍父母和媒人讨价还价的过程……穷让人的心都残破了。

老三后来总算定下一个媳妇，交了钱，第二天早晨领走，瞎眼的母亲在寒风里扶着墙，大哭。

下一张是女儿穿着新棉袄，蹲在脏雪里埋着头哭。

有的摄影师就停在这儿了，可是马宏杰没有。

下面的照片是等嫁过去了，这个姑娘不干活，还不断在小卖部赊东西吃，家里受不了，给了100块钱，让她回去，她怕是假钞，让换成两个五十。

老三后来遇上一对兄妹，给了一万二，还有金戒指、耳环，人家拿了后跑了，老三被“放鹰”了。

老三再去宁夏，这次招来个叫红梅的媳妇，生了小孩。可是过两年，红梅

想家了，喝了老鼠药。老三只好让她回去，可不久又说还是这里好，回来了。

最后一张照片，是一家三口自顾自地向自己的方向发着茫然的呆。

马宏杰还是没停在这儿，他还要拍下去。老三他跟拍了近30年，后来又拍了刘祥武，一个跟老三有着相同需求的湖北青年，一直拍到现在。

这些照片没有什么谴责，也没有颂扬，就是观察。马宏杰拍的都是自己愿意拍的东西。《西部招妻》里的老三，是他的远房亲戚——“想拍纪实摄影，先把自家后院拍好。”他说。

以前看过一个河南斗狗的视频，狗撕咬得极可怖，赌的人蹲在地上向狗狂喊，眼睛血红，嘴角挂下一长线口沫。

站在旁边的，全是花钱来看的人。老人妇女都有。抱着孩子在看，抿着嘴笑，还有人嗑着瓜子。

我看的时候心里难受，那个印象一直在。

跟马宏杰聊，他说他也在拍这个题。

他跟那个斗狗的老板是朋友。对方不久前还给他打过电话，很熟稔的口气：“哥很不幸啊，又娶个新媳妇。”

很明显，他不是站在动物保护者的角度去拍的。

我问他：“你没有那种难受吗？”

他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说他不轻易用谴责的方式，他只想“知道为什么”。

他的照片就是这样。

马宏杰拍耍猴人，一开始是在街上遇见，感兴趣，就陆续跟拍了近十年。马宏杰跟他们一起扒火车，带着馒头和十公斤自来水，众人躲在下雨的敞篷车厢里，头顶塑料布站着。猴子套着绳索，钻进人堆里避雨，都瑟缩着。晚上，

马宏杰跟他们一块儿睡在立交桥下。

有张照片是耍猴人鞭打猴子，鞭子抽得山响，一个路人上前指责猴戏艺人虐待动物，要驱逐他们。下一张是猴子像被打急的样子，捡起一块砖头向耍猴人老杨扔过来，又从地上操起刀子和棒子反击，撵得老杨满场跑，围观者开始喝彩，把石头和水果放在猴子手里。收工之后，老杨说这是他和猴子的共同表演，鞭子响，不会打到猴子身上，否则打坏了，靠什么吃饭？这场戏有个名字，叫“放下你的鞭子”。

收的钱里有张 50 元的假币，老杨心情不好，盛了一碗饭蹲在窝棚边吃，大公猴拿起一块石头扔到锅里，把一锅饭菜都打翻了。——每天回来吃饭，猴子都是要吃第一碗的，这是祖上传下的规矩，老杨这一天忘了。

马宏杰拍耍猴人的女人——她用乳房给小猴喂奶，小猴子亲吻她。耍猴人的小儿子最爱其中一只小猴，有张照片是熟睡中的小猴子躺在小男孩胸膛上，在被子里露个头，一只细小的黑毛手掌搁在孩子脸蛋上。

这些细节，看见一点，蒙在人心上的成见就掉了一些。

我没想到的是，马宏杰曾经也是调查记者，后来没法儿再做了，就“停下来去拍普通人吧”。他说自己已经放弃了那种激烈的性格，更希望能做点平实的东西，告诉人们在激烈的背后还有这些“为什么”。他说有摄影师为了拍草原上不落的太阳，整整拍了 20 年，而他要拍的是人，是一个消逝就不再见的时代，要不然，拍一辈子：“白拍了，或者说，白活了……”

普通人就是普通人，马宏杰没有把这个词诗化，照片里的生活就像它本身一样，笨重粗粝，人的心里都磨着沙石，吃着劲，但活着。

刊登马宏杰作品的《读库》主编老六说：他选这些照片，主要不是因为马宏杰花的“时间”和“心血”比别人多，而是往往大家都认为，拍弱者，拍穷人，拍底层的人，都要把他们拍成高尚的，或者让人同情心酸的人，“预设主题进

行创作，这是一种可怕的习惯”，但是马宏杰超越了这种“政治正确”。

我跟六哥说：做节目常犯的毛病，是刚爬上一个山头，就插上红旗，宣告到达；马宏杰是翻过一座，前面又是一山，再翻过，前面还是，等到了山脚下，看到远山还是连绵不绝。

马宏杰一直在跟拍的六组故事，都是这样。他拍东西有一个很可怕的时间长度，这种跨越有时候挺吓人的。他说他一定要活到最后，一直把这些人拍下去，“拍到他们死，或者我死”。

我问马宏杰他的原则是什么。

“真实。”他说。

接地气的马宏杰

杨锦麟

与马宏杰相识，缘起于老六的《读库》。

那篇《耍猴人江湖行》，那冷峻的笔触、冷峻的镜头、冷峻的黑白照片，以及马宏杰数年坚持不懈的记录写实过程，让我不仅甚为感动，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记不清是如何与马宏杰取得联系的，是我先在《有报天天读》节目中的“浮世绘”环节里，介绍过他的采访经历和摄影作品，还是他先主动和我取得联系的？时隔多年，印象有点模糊，但这又何妨。在浮躁的、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能如此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忠于现实地记录一个新闻过程，一个人物的命运，一个大时代里小人物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何其不易。

只要记住这一点，记住马宏杰的名字，就足够了。

2008年底2009年初，我参与了凤凰卫视《走读大中华》的主持和拍摄。那是另一种不可多得的人生阅历，感谢这个栏目，让我有机会在其后的数年间，几乎走遍了祖国大地的繁华都市、穷乡僻壤，记录了中国更真实的另一面。

很荣幸，我在走读过程中，找到了像马宏杰这样的知音，这样的同行。

在《走读大中华》编导张征的居间联系下，我与马宏杰有了合作的机缘，跟随他曾经记录的河南新野耍猴人，在江西余干做了一次近距离跟拍记录。

那是个雨雪交加的寒冬，与耍猴人相处的那几天，我和我的伙伴们用摄像

机，马宏杰用照相机，完整地记录了耍猴人的艰辛。节目播出之后，引起了诸多反响，我和我的伙伴们真实感受和分享了马宏杰一以贯之的专业主义态度和精神，那是一般人在空调房、暖气屋里无法获得的对生命价值的追寻和体验。

再就是2010年冬天，随马宏杰一起，从湖北出发，一路记录湖北大龄青年刘祥武到宁夏固原“买妻”的过程。

这一过程，在马宏杰的书中共有详尽的记录，此不赘述。刘祥武没“买”到妻子。分手时，我将身上的军大衣脱下，送给了衣衫单薄的他。我和马宏杰一样，只是一个小人物一段命运的记录者，我无法帮助他实现“买妻”的梦想。

参与《走读大中华》节目的拍摄，是一个足以令人心力交瘁的过程，时常会在充满自责和内疚的情绪中辗转反侧，备受煎熬。这是因为，你看到了太多最底层人群的疾苦，看到了太多无助，太多陷入困境时的绝望面孔。你也许可以帮一些人，或完成一些事，但你根本没有能力去帮助所有的人，做所有的事。这会让你更加充满无力感、焦灼感，甚至负罪感。

他们告诉我，这是忧郁症的前兆。

也因此，我对马宏杰近30年如一日的坚持，对他始终如一、一本初衷的努力，越发充满由衷的敬佩。

以马宏杰的从业经验和专业技能，他大可以更多地迎合市场，拍摄一些媚俗的、商业的，可以获得更多声誉和名利的作品，他所服务的新闻单位，具有海内外极高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马宏杰大可以不必选择这一类吃力未必讨好的选题。但他没有选择捷径，没有选择安逸，没有选择仅仅是行走于山水之间的悠闲自在，没有选择仅仅用镜头去展现大自然的美和诸多造化。

我看过马宏杰其他的作品，比如南海西沙的那一组彩色图片。为了追求最好的效果，他甚至专门去学习水下摄影，并获得了国际认可的水下摄影师资格。看得出，他是个很认真执着的新闻从业人员。

我知道他的每一次跟拍、记录，几乎都是在燃烧生命的一部分去完成，他的记录对象，几乎都是社会最底层、最贫困、最无助的个体和人群。

他可以有更多选择，但他选择了最难的。也因为最难，才会有如此的灿烂和精彩。

2014年春节前，接到马宏杰的电话、短信和信函。他告诉我，浙江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老马看中国”系列的《西部招妻》《耍猴人江湖行》等作品，提醒我，数年前我承诺过，一旦他出版关于这段记录和历程的书，我要为他写点文字。

提笔之前，我想起了这些年，自己在不同场合反复提过的六个字：“接地气，说人话。”

这六个字，其实就是一个大时代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伦理准则和行为规范，这不仅是责任，也是担当。

马宏杰就是这样一个担当者。

他还会继续坚毅前行，还会继续负重远行，我对此深信不疑。

是为序。

甲午春于香港

我关心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

马宏杰

一个人永远走不出童年的影响。我的摄影之路，最初是在寻觅儿时记忆里的环境和人。

我出生在那个全民饥荒刚刚结束的年代。家里没给我留下一张小时候的照片。我的父亲兄妹五人，他排行老四，是家里学习最好的孩子，本可以上大学，因为爷爷有病，为减轻家里负担，1958年7月，他中学毕业后就工作了。当时国家有政策，凡在工厂考上大学的人，一切上学费用由厂里承担。父亲打算边上班边学习，不承想赶上“大跃进”，每天工作长达12小时。上大学的梦想，也就没有了。

父亲至今珍藏着自己结婚前的一张相片，相片里的他很文艺，是个美男子。刚上班那会儿，父亲认识了一个女孩。那女孩胆大，很喜欢他，经常主动找他搭讪。父亲也喜欢她，就是担心自家条件差，和女孩家不是门当户对。有一次，在女孩的宿舍，两人交谈到很晚，父亲准备回家时，女孩极力挽留，还把灯给关了。这举动的言外之意，父亲当然清楚，但他不知所措地说了句“这样不好吧”，就起身离开了。从此，女孩没再找过父亲。

父亲20岁时，通过亲戚介绍，认识了母亲。母亲生在农村，和父亲没什么共同语言。1962年，父亲和母亲结婚。母亲很高兴，她嫁给了一个有文化的城里人。

后来就有了我和弟弟。从我们记事起，父母就经常吵架甚至打架。父亲遇

到问题喜欢讲道理，没文化的母亲偏不吃这一套。生活中这些琐碎又巨大的矛盾，就这样伴随着他们的一生。那个年代，离婚是很丢人的事，他们只能凑合着过下去。

父亲在洛阳玻璃厂工作。我还没上学时，他总带着我和弟弟上班。玻璃厂有三个门，有的门卫看他带着孩子，经常不让进，他就绕到别的门进去。时间久了，厂里的门卫都认识了那个带孩子上班的男人，在他进门时常说一句“要斗私批修呵”，来刺激他一下。

等我稍大一些后，父亲把我送到郊区的爷爷奶奶家。

爷爷走路时，腰是弯着的，那是接近 90 度的弯曲。我问父亲：“爷爷的腰是不是给地主做长工时累成这样的？”那个年代的电影里常有这样的情节。父亲说：“不是，爷爷年轻时家里穷，他用扁担挑着面粉去赶集，回家后把换来的麦子磨成面粉，再去赶集。每天挑着很重的担子赚钱生活，时间久了，腰就弯成这样了。”

爷爷家有两孔窑洞，一孔自己住，一孔给我大伯住。有天早上，奶奶盛好饭，让我坐在窑洞前的凳子上吃。当时院子里堆满了刚刚收获的玉米，爷爷对站在院子里的大儿子说：“宣立（我大伯的名字），你帮我把这些玉米扛到窑洞上的场里晒晒。”我大伯说了一句他没工夫，就走开了。爷爷开始自己装玉米。当爷爷背着一个大麻袋，身体弯成近 90 度，从正在吃饭的我面前走过时，那场景让我惊呆了。别人是用肩膀扛东西，爷爷是用腰扛东西，装着玉米棒子的大麻袋，像一座山压在他身上。

我放下饭碗，不作声地跟在爷爷身后。我知道他还要爬一个约 30 度、长近 20 米的土坡，才能把玉米运到我们住的窑洞上面。我跟在后面，看爷爷把麻袋放下了，我拉着他的手问：“为什么大伯不帮你把玉米扛上来？”爷爷笑笑说：“分家了，他地里有活干，顾不上了。”

奶奶虽然没有文化，却是一个聪慧善良的人。她住的窑洞只有一个门，为了屋里亮一些，就在门旁挖了扇窗，找了些胶布作遮挡，常会漏风漏雨，冬天还得用砖头再砌起来御寒。我问奶奶：“我爸爸就在玻璃厂上班，让他从厂里拿一块玻璃回来装上，不就可以了吗？”奶奶说：“孩子，我们马家人不能随便拿公家的东西，这和偷人家东西一样不道德。”我于是跟奶奶说：“等我上班后，第一个月挣的工资，就去给你买一块玻璃，装在窗户上，让太阳照进来。”那时我五六岁，在奶奶的窗户上装一块玻璃，成了我最大的愿望。

1972年春，奶奶去世了。那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没有实现对她的承诺。

同一年秋天，爷爷去世了。爷爷去世的时候不是躺着的，父亲拿一床被子垫在他背后，爷爷就这样弯着腰，半坐在那儿，永远和我们告别了。

爷爷奶奶的墓地在焦枝铁路旁。每次坐火车路过那里，我都会到窗口去看望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墓地周围盖起了楼房。现在我坐火车路过时，再也看不到他们的墓地了。

我小时候非常调皮胆大，经常带着小伙伴们上房掏鸟蛋，下河抓鱼虾。有一次我爬上玻璃厂30米高的烟囱，被母亲发现。我坐在烟囱上，远远看见她往这边跑，立马下来，溜得不见踪影。为此，我没少挨父亲揍。父亲的教育方式很传统，“棍棒之下出孝子”“头悬梁锥刺骨”之类的话，他没少跟我讲。

我的一个小学老师经常来我家做家访，她每来一次，我都得挨父亲一次揍。班上还有一个跟我家一样穷的孩子，他也经常因为老师家访挨揍。那会儿，学校没有少先队，只有“红小兵”。除了我俩，班上其他同学都是“红小兵”。

1976年夏，我们小学毕业了。开完毕业典礼，老师把我和那个孩子叫到办公室：“我宣布，你们俩从今天起是‘红小兵’了。”当时学校里已经没有别人了，所以至今也只有三个人知道，我们俩也是“红小兵”。就这样，我小学毕业了。

我的中学老师里，有一位教英语的印尼华侨。有一次学校开运动会，要求男同学一律穿白衬衣、蓝裤子。那时候社会上流行“的确良”布料，很多同学都用这种布料做了白衬衣。父亲为省钱，用农村织的粗白布给我做了件衬衣，还用漂白粉漂白了。

这位华侨老师看到全班就我一个人穿了这样一件白衬衣，在冷嘲热讽后居然踢了我一脚，让我站在队伍的最后面。那一刻，我心理上受到了巨大打击，处于叛逆期的我，甚至想冲上去揍他一顿。

从那以后，我有了退学的想法。最后还是班主任谢老师做我父亲的工作，我才上完中学。

1983年，我中学毕业后，在玻璃厂的待业中心打工。当时有个朋友喜欢摄影，花700多块钱买了一台理光5相机，那时候我常和他骑车去龙门石窟、白马寺、关林庙拍照。那年代不称“摄影”称“照相”，大家把照相馆的师傅也称为“照相的”。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发表的作品是用借来的相机拍出的。

1984年，我也花700多块钱，买了一台玛米亚单反相机，开始自己冲洗照片，在报刊上发表更多作品。1989年，因为没钱结婚，我把这台相机卖了。结婚两年后，我又买了人生中第二台相机：美能达700。

起初，我常在田间地头，还有车间里、马路上寻找题材，用镜头唤醒儿时记忆中的画面。慢慢地，对摄影的兴趣转换为内心深处的热爱。摄影开始成为我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我开始接触到一些摄影大师的作品：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Henri Cartier Bresson)、约瑟夫·寇德卡 (Josef Koudelka)、萨尔加多 (Sebastião Salgado) ……

有一天，我在《国家地理》杂志上看到一组“喜马拉雅采蜜人”的图片，心灵深处感到强烈的震撼——原来摄影师还能用如此罕见的视角，传播人类的生存精神！于是我决定，我也要做这样的摄影师。

我义无反顾地从工厂辞职。我相信自己完全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大量拍摄专题图片。一年时间里,我拍光了两千多个胶卷。

1992年,我和几个爱钻山沟的影友来到河南新安县峪里乡,发现这里都是石头盖的房子,人们还保持着原始的生活习惯。这里有血参、天麻、五灵脂等珍贵药材,都深藏在悬崖峭壁上。我认识了以采药为生的于青发,他和同伴们身系绳索,攀援在绝壁之上,出没于黄河两岸的大山之中。从1992年起至今,我每年都会和于青发他们进一次山。每次下悬崖拍摄时,他们都用碗口粗的绳子绑着我,并且总是他们先下我后下,极力保证我的安全。当时我就是想近距离拍出最真实的相片。一个摄影师想要有好作品,必须有直面生死的勇气。

为学习摄影和新闻写作,我先后读过几个学院的相关专业。1994年,我到河南经济日报社当起了摄影记者。后来,我又到河南法制报社做记者。十年间,我做了四家报社的记者。中国的变革很快,很多社会矛盾开始进入我的镜头,一些祈求正义的人也希望媒体给予他们更多关注,认为媒体是化解社会矛盾的一股力量。

刚开始做记者时,我很有正义感,但是在后来的工作中,发现自己的力量竟如此渺小。很多次,事实已调查清楚,报道也写出来了,却无法刊登。当老百姓跪在我面前,把我当成他们的救命恩人时,我的内心承受不起。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在中国,有些事情是我这样的摄影记者解决不了的。我开始寻找另一种记录方式。我的拍摄开始转向人文故事,记录常见的百姓生活场景。我希望观者能从这些本真而平凡的图片中,品味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有些题材和人,我一直跟拍了十多年。

从1984年有了自己的相机后,我就开始拍老三了。当时没想到以后会得

到这么多关注。1989年，有些照片因无处存放，我就烧掉了，现在想想很是后悔。

2008年开始，老三“招妻”的故事开始在《读库》上发表，随后我收到了刘祥武的信，这个纪实影像专题延续到他身上，也是我没有料到的。老三是那个老实巴交、逆来顺受的农民。刘祥武是个社会经验较多，固执地按自己的价值观和正义感生活的人，既愤世嫉俗，又渴望幸福安稳的家庭生活。

我一直希望能帮刘祥武改变现状，甚至答应帮他找老婆，但是很难。2013年12月2日，《西部招妻》完稿后，我又见到了他。不知他今后的路会怎样。我会一直关注老三和他。我想在我死之前，看看这个社会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变化。

2001年6月的一天，我在洛阳街头拍摄时，看到几个身背猴子的耍猴人在赶路，就对这群人产生了兴趣，想拍摄他们的生活。我来到河南新野县樊集乡冀湾村，打听耍猴人的事情，村民们却对我这个拿着相机的外来人非常警惕，经常答非所问。直到一年后，我才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人贩子经常将一些川皖等地的女子骗到这里贩卖，村里一些人也买了女人来做媳妇，他们是怕有人来暗访。此外，村里的养猴人常被有关部门以“保护动物”为名进行查处和罚款。所以，他们对陌生人格外警惕。

经人介绍，我认识了鲍湾村猴场老板张云尧，在他的引荐下，我才得以进入这个江湖耍猴人的群体。我拍耍猴人老杨时，他起初不信任我，直到我和他从襄樊扒火车到成都，然后又扒回来，他才开始跟我说心里话。刚到成都时，下起大雨，老杨他们在高架桥下找了个干的地方，把塑料布打开铺下，我们八个人在此过夜。为了我的安全，老杨他们睡觉时把我夹在中间。我的摄影包和相机装在编织袋里，枕在头下。

一路上，我都是和老杨一起吃饭。扒火车时，本来我有机会到车厢里睡觉，但是没去，留下来和老杨他们睡在敞篷车厢里。在老杨家里的时候，他跟我说